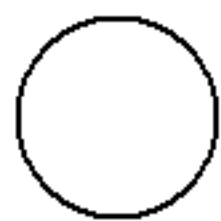


红旗

HONGQI



11

一九六一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 ★

目 录

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

一个法宝 李维汉 (1)

实验、抽象和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

作用..... 何祥霖 (12)

关于百家争鸣的一个问题..... 黎庶之 (23)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材料的调查..... 谢 商 (27)

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的真相 廖 原 (31)



統一战綫是中国人民爭取胜利的一个法宝

李 維 漢

編者按：李維漢同志計劃写几篇文章，系統地論述我国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經驗。本期发表的是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将在本刊下期刊出。

毛澤东同志經常強調，为了战胜異常强大的敌人，为了建設我們的国家，必須在無产階級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結成广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在我国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民主統一战綫有着不同的內容，担負着不同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經驗证明：不論在民主革命时期，或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在我們党的政治路綫中，都必須正确地处理統一战綫問題。只有这样，我們的革命和建設才能胜利，才能发展。

中国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发生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是中国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轉变为新民主主义，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轉折点。“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运动，这个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民主統一战綫的序幕。“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他們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战綫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①

中国共产党，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結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首先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领导了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这个运动遭到了全副武装的反动統治的鎮压，暂时轉入了低潮。中国工人階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深刻地懂得：“他們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組織性的階級，

^① 《新民主主义論》。《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3頁。



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① 中国共产党在它的一九二三年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以便由此展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并且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代表大会批判了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革命，国民党不可能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因此拒绝革命统一战线，并且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代表大会也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只能站在帮助的地位，因此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就论述了救中国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和以后的各个时期中，毛泽东同志都代表党的正确思想，同以上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

国民党的前身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它是一个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到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联盟。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大部分丧失了革命活力，陷于涣散状态。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继续斗争，但是屡次失败，濒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俄国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发生的新的革命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在绝望里，……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②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于一九二四年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并且改组了国民党。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自始就反对国共合作，破坏代表大会的决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以后，他们的反苏反共的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形成了所谓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共产党人经过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团结中间派，对右派展开尖锐的斗争，努力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变成实际。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通过这次合作，党发动和领导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这期间，不仅工人运动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达到了以一九二五年“五卅”罢工为中心的全国高潮，而且在南方几省掀起了广大的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因此有了工农联盟作基础，成为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基础之上，国民党发展成为民族民主革命联盟。在这个基础之上，创造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争取解放的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0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页。



斗争。“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①

但是，当时的革命阵营还是不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虽然获得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但由于我们的党那个时候还是幼年的党，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性，不懂得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在北伐战争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群众运动，所以，这个统一战线还缺乏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武装作为它的中心支柱。而当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群众运动也都塌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派即中间派，则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而愈来愈恐惧，愈来愈动摇。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又还占据着重要的实力地位，许多政权机关和军队把持在他们的手里。在西山会议派遭到打击以后，他们找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新的代表，从一九二六年起，展开了各种新的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企图窃取革命的领导权，从内部来出卖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坚决依靠工农和武装工农，才有可能稳定中间派，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以击退反动派的进攻。当然，敌人是很强大的，因为它不但包括地主买办阶级，而且包括支持地主买办阶级的国际帝国主义。但是，当时共产党如果采取了这样坚决的革命政策，是有可能避免至少是减轻后来的失败的。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根据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所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地指出谁是革命的真正朋友，谁是革命的真正敌人，要求党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尤其要求党充分地估计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坚决地领导农民斗争，武装农民，在乡村中建立革命政权，以壮大和巩固革命的基础。可是，当时占据党的领导机关的陈独秀投降主义分子，拒绝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他们在统一战线中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不但不敢坚决依靠工农运动，积极武装工农，反而抑止工农运动，特别是抑止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运动，来迁就地主资产阶级，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国民党右派。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革命遭受了严重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期间，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革命统一战线中只剩下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以及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些人，并且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和损失。但是，英勇的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

^①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53页。



继续战斗了。”^①共产党迅速地克服了陈独秀主义，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和湘、鄂、赣等地的秋收起义，并且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深入农村，紧紧地依靠农民，展开了农民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使工农联盟获得牢固的政治基础和武装支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成为我国民主革命中工农联盟的主要形式。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在农村中富农和地主也有不同，我们必须正确地、尽可能地联合或者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因此，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根据地规定和执行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消灭地主经济，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土地革命路线；规定和执行了奖励私人经济，同时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并力争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实现领导的经济政策。凡此都促进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发展，因而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给全国人民以希望，指出了走向胜利的方向，而成为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因素，并且为征集更广大的同盟军、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准备了重要条件。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蒋介石政府对外不抵抗、对内加紧“剿共”和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举行了侵占全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使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降为次要的矛盾，国内各阶级的关系发生了新的组合。工人、农民、学生的抗日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原来附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的中间政治力量，也逐渐转向主张抗日。甚至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间也出现了某些抗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首先主张武装抗战，并且积极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和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一九三三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宣言在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群众的三个条件下，同国民党中愿意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共同抗日。但是，由于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党没有能够利用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的有利条件，去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他们都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都对整个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采取“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政策。而发展到最高峰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更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同反对地主买办阶级并列，否认中国革命中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甚至把那些同蒋介石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当作“最危险的敌人”。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36页。



的政策，为时达四年之久，其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到孤立，革命事业遭到很大的损失。在这个严重的历史关头，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举行的党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挽救了党，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这些骨干成为尔后我们党胜利地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核心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划时期的，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地前进。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经过长征，胜利地到达了陕北。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一步向华北进攻，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一步发展起来，革命形势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重新走向高潮。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进攻，造成了中日矛盾更加突出、更加尖锐，英美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以及国内各阶级之间的矛盾都相对下降的形势。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力量更多地更为积极地转到抗日方面来，而且地主买办阶级的营垒和国民党内部也开始逐渐地分化为主张投降的亲日派和一定程度上倾向抗日的英美派。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迅速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号召和领导广大人民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①这就是组成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人民革命武装为中心支柱的，包括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接着说：“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②为了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克服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在当时和以后的时期，系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为了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改变对外投降、对内进行反人民战争的反动政策，中共中央继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之后，在一九三六年五月进一步向国民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接着，同当时在西北进攻红军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达成停战协议；接着，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特别是经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迫使蒋介石国民党停止了进行十年之久的反革命内战。在“七七”事变以后，形成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对日抗战的局面。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从工人阶级到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它包括了

①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46、151—152页。



进步力量（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间力量（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此外还有一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顽固力量（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资产阶级）。针对这种阶级组合的情况，针对蒋介石国民党一面被迫抗日、一面又坚决反共的两面性，并且鉴于过去两个时期中“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这两种片面政策的错误，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自主，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全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斗争，克服了在抗日战争初期发生的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第二次王明路线。这个错误路线抹杀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反对划分左中右，主张一切经过蒋介石国民党的同意，而放弃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的方针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在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和毛泽东同志紧紧地抓住了一个对全局有决定影响的主要环节，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尽一切可能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了争取地主阶级以及和这个阶级有联系的人们共同抗日，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停止执行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而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发挥民族资本和私人经济的积极性，党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为了团结一切抗日民主人士共同奋斗，党采取了“三三制”（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联合政府政策。就这样，党在根据地内发展和巩固了工农联盟，并把其他抗日阶级阶层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由于抗日人民武装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巩固，就使敌伪军日益陷落在中国人民的分割和包围之中，不能达到占领全中国的目的；就使全国人民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有了榜样，看到了胜利的前途和人民共和国的远景，坚定了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信心；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强有力的支柱，有利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就有力量对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且阴谋分裂、准备投降的蒋介石集团，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之不敢公开破裂投降，并且胜利地打退了他们为公开投降、全面内战作准备的历次反共高潮。总之，由于抓住了这个主要环节，党比较顺利地掌握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从而把抗日战争引导到最后胜利。

由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了伟大的发展和成功，积累了完整的和丰富的经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成果，革命武装的成果，革命根据地的成果，党的建设的成果，连同各方面丰富的经验在内，为以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极为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支持之下，采取了反革



命的两手：一手积极准备内战，一手进行和平欺骗。党和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方针：一方面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一方面准备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争取和平、民主，是当时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独裁、内战政策，同全国人民的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美蒋装出和平、民主姿态，只是为了欺骗人民，孤立共产党，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大规模的反革命内战。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坚持这种反动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使自己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党和毛泽东同志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并且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这场复杂的曲折的斗争。经过这场斗争，终于使中国人民中的许多人，主要是中间阶层的分子，丢掉了对于美蒋反动派的幻想，而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则在全国人民中获得空前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场重要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为人民解放战争铺平了道路，从而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一年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并且实行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①这样一个基本的政治纲领；提出并且实行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②这样一个基本的经济纲领。依靠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和正确的战略指导，人民解放战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革命运动都迅速地进入了高潮，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和巩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人民解放军已由防御转入进攻。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彻底暴露。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已经破产。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获得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战争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人民革命运动更加发展到这样的广泛和强大，终于把我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反革命统治，从四面八方，加以包围，加以瓦解，最后把它打倒，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的基础之上，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达到了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在内的伟大规模。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37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3页。



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随着革命性质和革命任务的转变，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需要而且可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因此，从三十年民主革命的战火中锻炼出来的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的统一战线，在新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转变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统一战线。

在建国的头三年，即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和其他民主改革的斗争，恢复了国民经济。这些斗争的胜利，大大地巩固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且为全面进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一九五三年，党中央正式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农业和其他个体经济是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采取和平的方法，逐步地进行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而人民手里又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国民经济的命脉，所以我们能够经过和平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党的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很快，在一九五五年冬天和一九五六年春天，就相继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接着就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使我国多种成分的经济结构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工农联盟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都进到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这个时期内取得的伟大成果。但是，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却还远没有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也还需要一个逐步习惯的过程。不甘心于资本主义灭亡的资产阶级右派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在一九五七年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国人民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全民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取得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革命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因此空前高涨，资产阶级的多数人也因此不同程度地转过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弯子，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个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个总路线的指导下，展开了农村



人民公社化和国民經济大跃进的局面，掀起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高潮。

在經济战綫上、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取得了偉大胜利的基础之上，在总路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之下，我国过渡时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工农联盟已經被提高到实现公社化和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民族资产阶級分子正在进入根本改造的阶段，即逐步改造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阶段。

一般說来，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是不断发展和不断巩固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阶段仍然是这样。党在社会主义阶段，对资产阶級分子和资产阶級知識分子以及其他民主爱国分子，采取包下来，包到底，加以安排使用，又加以教育改造的根本政策；对于一切願意合作的民主党派，則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因此，一切願意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半途而廢的人們，都必将經過长期合作和根本改造，在将来共同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可以預見，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战綫将会繼續巩固和发展，直到阶級消灭，实现大同。

从上述的历史发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人民民主統一战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一个法宝，一件武器，同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胜利的一个法宝，一件武器。

远在一九三九年，毛澤东同志就从党的十八年的丰富的历史經驗中，总結出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問題或者三个主要法宝。他說：“統一战綫問題，武装斗爭問題，党的建設問題，是我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問題。”“統一战綫，武装斗爭，党的建設，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①过了十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的胜利。这时候，毛澤东同志为紀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写了《論人民民主专政》一文，进一步总結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經驗，并且給中国人民指明了繼續前进的道路。他說：

“一个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联系人民群衆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軍隊。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級各革命派别的統一战綫。这三件是我們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們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胜利。”^②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論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換了中国的面目。到現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

① 《(共产党人)发刊詞》。《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97頁。

②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4頁。



基本的經驗，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众。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农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綫，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农聯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国家；（二）在國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結成国际的統一戰綫。”①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产党）領導的以工农聯盟为基础的民主專政。这个專政必須和国际革命力量團結一致。这就是我們的公式，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②

“就是这样，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資產階級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让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义，資產階級共和国让位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階級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国。”③

毛澤东同志在这里所指明的中国革命的經驗和道路，如果用一句話来概括，可以这样说：在工人階級（經過共产党）領導之下，以工农聯盟为基础，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进行武装斗争，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然后，經過和平的道路，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經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中国人民能够获得彻底解放的唯一的歷史道路。这个基本思想，像一根紅綫一样，貫串在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中。我們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研究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經驗，必須很好地体会和掌握这个基本思想。

有人提出問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阶段，人民民主統一戰綫还是不是一个法宝或者武器呢？毛澤东同志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九五〇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毛澤东同志讲明了我們国家經過战争，經過新民主主义的改革，然后走到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之后，接着說：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國外，我們必須堅固地團結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絲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國內，我們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須巩固我們这个已經建立的偉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統一戰綫。不論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統一戰綫的巩固工作

①②③ 《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7、1485、1476頁。



有所貢獻者，我們就歡迎他，他就是正確的；凡對於這個革命統一戰綫的鞏固工作有所損害者，我們就反對他，他就是錯誤的。”^①

一九五六年，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毛澤東同志總結了我們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基礎經驗，又說：

“就國內的條件來說，我們勝利的獲得，是依靠了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並且廣泛地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進行偉大的建設工作，在我們的面前，擺着極為繁重的任務。雖然我們有一千多萬黨員，但是在全國人口中仍然只占極少數。在我們的各個國家機關和各項社會事業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黨外的人員來作。如果我們不善于依靠人民群眾，不善于同黨外的人員合作，那就無法把工作做好。在我們繼續加強全黨的團結的時候，我們還必須繼續加強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必須認真地糾正在任何工作環節上的任何一種妨害黨同人民團結的不良現象。

在國際範圍內，我們勝利的獲得，是依靠了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②

一句話，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的取得，仍然是依靠了一個國內的統一戰綫和一個國際的統一戰綫。

為什麼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民民主統一戰綫仍然是一個法寶或武器呢？可以列舉許多理由，這裡只舉出最重要的三點：（一）工農聯盟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沒有現固的工農聯盟，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隨着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工農聯盟也日益鞏固和提高。（二）我們需要經過統一戰綫，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對民族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根本改造，以達到消滅這一個最後的剝削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目的。這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在過渡時期的一項偉大而又艱巨的歷史任務。同時，我們還面臨着帝國主義的威脅和國內封建買辦殘余勢力的搗亂，還要解放台灣，這也需要廣泛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共同奮鬥。（三）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對世界人民的聯系和影響越來越廣泛，對世界人民大團結事業所擔負的責任和應當作出的貢獻也越來越重大。只此三點，就可以充分說明，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在社會主義階段仍然是一個法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一個法寶。

^① 《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一屆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頁。

^②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頁。



实验、抽象和假說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 何 祚 庠 ·

科学研究必須从实际出发。自然科学研究必須重視总结群众的劳动生产經驗。恩格斯說：“人的思維之最本质的和最密切的基础，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非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①。毛澤东同志說：“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②人对自然进行斗争，主要方式是生产实践；因而从根本上說，自然科学理論是生产实践經驗的总结。

科学理論并不是由生产实践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从实践而得到的感性知識上升为理論的过程，是認識上一次的飞跃，“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③。自然科学在实现認識上的质的飞跃时，需要利用实验这种特有的形式和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把生产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問題，或者在观察自然界的过程中，把某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現象（包括天然的和人工的），集中并控制起来，系統地、精細地进行实验研究，来揭发事物的內

在联系。在实验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便試行抽象和概括，力图造成科学的概念和理論的学說。科学的結論常不是一下就能到达和完成的，所以在科学发展的某一阶段，科学的抽象会以一种或多种假說的形式出現。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些假說并檢驗这些假說，又設計出和进行新的实验。假如实验不断证明某一种假說是正确的，那末这种假說便将逐渐形成理論。假如实验推翻了这种假說，那末又要在新的实验材料基础上形成新的假說。如此不断反复进行。最后，由于实验材料不断地积累，精确度越来越高，条理越来越分明，加以人們不断进行抽象和概括，因而逐渐由假說过渡为科学的理論。

以上所述是自然科学理論形成的一个扼要的过程。当然，实际的認識活动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但上述科学理論形成的过程，却是較有代表性的。几乎在所有重大的自然科学理論的形成过程中，都使用了实验、抽象和假說这三种研究方法。对于这三种科学研

① 《自然辯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2頁。

② ③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280頁。



究方法的作用估計不足，是不对的。現在試分別地闡述一下这三种方法在科学理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一、实验

科学实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起着重大作用。它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毛澤东同志說：“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①。古代科学实际上几乎是完全没有实验研究的，因而古代的科学多半是一些原始观察的記載和生产經驗的描述。少数的例外，如阿基米德浮力等于物体排水量定律的发现，也只是依靠在简单的设备条件下进行的实验。近代的“实验的科学”，实际上只是当生产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发展起来。可以說，自然科学中的許多部門，只是在引进了近代实验方法以后，才成为严密的科学。

科学实验較之于对事物的直接观察，和由生产过程所得的直接經驗，有若干优越的地方。首先，实验将对原始的感性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把事物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揭发出来。在实验室中，利用实验方法，可以对各种自然条件进行精密的控制，摆脱許多偶然因素的干扰。可以把复杂的事物或生产过程，分析成若干单独現象，可以簡化若干复杂的自然条件。可以准确而精細地研究事物中的某些部分，这部分和那部分的关系。可以把某些現象重复若干次，可以在不同条件下进行比较，等等。总之，通过实验方法的研究，可

以使得事物中的因果关系更为清楚，条理脉絡更为分明，从而使科学研究得以在可靠而精确的实验材料基础上，作出科学的結論。其次，实验研究能够大大扩展人們的眼界。在实验室中，人們常常可以利用各种仪表和仪器来代替感官的直接观察，进行精密的測量。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实验室中，常常利用一些自动化设备来探索在各种特殊条件下（如高温、高压、低温、高速等）的物质运动規律，深入物质的构造。正是由于使用了这种实验的方法，因而就发现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現象、新規律，扩大了人們利用自然規律的范围。

有些人认为实际的生产过程是很复杂的，在实验研究中却常把复杂的条件加以簡化，这就要产生脱离实际的毛病。有些人还认为实验方法的倡导是和十六、十七世紀唯物論哲学家分不开的，这些唯物論哲学家的世界观带有形而上学的局限性，而实验方法却正好反映了他們所提倡的那种孤立的研究。

这样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人們对于客观事物的認識过程总是由局部到全面，由簡單到复杂。既要有对事物的分析，又要进行綜合的研究。如果不把局部的事物和簡單的事物分析研究清楚，对于整体的、复杂的事物也是弄不清楚的。当然，如果认为复杂事物就是簡單事物的机械的迭加，整体就是局部

^① 《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6頁。



的簡單的集合，那就將陷入形而上學。但是就人們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來說，分析的研究是必經的階段。沒有這種分析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在更高階段上的正確的綜合。馬克思說：“物理學者考察自然過程時，要在它表現在最精確的形態且最不受擾亂影響的地方去考察；如可能，還在各種條件保證過程正常進行的地方做實驗。”^①

例如，生物體內的新陳代謝過程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生物化學過程，其中包含了多種多樣的複雜的有機化合物。要想一下弄清楚新陳代謝作用的全部生物化學作用是不可能的。生物化學家在研究這些問題時，一種辦法是設法把其中若干有機化合物提取出來，研究它們在純粹狀態下的各種化學性能。另一種辦法是在生物體中加入一些放射性碳、磷或氫。由於這些原子帶有放射性，人們得以用計數管或照相乳膠來“追蹤”這些帶有標記的原子，把它們所經歷的化學歷程從錯綜複雜的現象中分離出來，從而進行精細的研究。不难看出，人們通過這種實驗的辦法，便能逐步了解生物體內一些細微的變化過程，並能設法有效地加以控制。假如我們只是籠統地觀察生物體的新陳代謝過程，就只能停留在一般觀察的階段，而不能獲得有關這些過程的深入一步的知識。

又如，物理學工作者為了要研究固體的電學或光學的性质，常常希望能擺脫固體熱運動的干擾。因此，便將這些固體材料放在接近絕對零度的低溫下。這時，人們不但能

對這些材料的電的或光的性质作更深入的研究，而且還發現了新的性能。例如，有若干材料在低溫下具有特殊優良的導電性能，這種導電性能可能有重大的實用價值，而在從前卻為熱運動所遮蓋住了。由此可見，用實驗方法研究這種“純粹化”了的狀態的物質特性，常給科學帶來重大的利益。

但是，進行科學研究的目的是終究是為生產實踐服務。科學工作總是以直接的或間接的方式，甚至通過曲折的過程，應用於生產實踐。在實際應用科學成果於生產實踐時，如果不照顧到實際生產中的具體條件，就很難使實驗室的工作結果，直接應用到生產實踐中去。實際的生產條件和實驗室總是有不少區別的。在實驗室內，人們可以使用“化學純”甚至“光譜純”的化學材料，在現場就不能應用。那末，人們怎樣能保證實驗室的研究結果無誤地應用到生產實踐中去呢？這裡有以下兩種不同情況。

第一種情況。在有些學科中有一種“模擬理論”，專門研究實驗室中模型試驗的結果能夠在什麼條件下無誤地推廣到實際中去。另有一些學科憑借經驗的積累或理論的分析來提供這種判斷。例如，在宇宙飛行中，人們先用動物作飛行的試驗。由於所選擇的動物，如狗具有和人相接近的生理條件，因而在一定條件下，由動物試驗所獲得的超重和失重條件下的生理反應的知識，就能幫助我們來推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頁。



測人是否适宜于作宇宙飞行。此外，在有一些学科中，常采用扩大試驗或中間工厂的办法来逐步地扩展實驗室中研究所获得的成果。

第二种情况。在若干学科中，确实也还没有完滿的理論或經驗足以保证實驗室工作結果直接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例如，在农业科学研究中，實驗室的研究常常只对某一因素进行較深入的分析，而在实际生产中却总是多种因素同时起作用，互相影响。因而单纯地从事实驗室研究，就不免含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实驗研究，仍有重大作用。因为在實驗室条件下，各种物理因素較易控制，条件比較单纯。人們对于簡化了的事物进行研究，比起对于复杂事物来总是容易一点，也更容易发掘出它們的規律性。人們在掌握了簡化了的事物的規律性以后，并进一步把它和实际条件进行对比，就更能弄清楚較复杂的事物的規律性。在这种情况下，使實驗室中的工作和現場的生产实践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有时人們可以根据在簡化条件下对事物的研究，提出某种嘗試性的建議，試看能否付諸实行。人們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提出了某些新的經驗，这些新的經驗能否推广，或在什么范圍内什么条件下进行推广，有无普遍意义，不进行實驗研究往往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由于在實驗室活动中，工作的循环周期較短，工作量也較小，因此，在實驗室工作，能很快地起一种“过滤”作用，把一些不可行的建議加以否定，只留下有希望能

实行的那些合理化建議。特別重要的是，在實驗室工作中，有时从表面上看来和实际生产中发生的問題离开得很远很远，但实际上它却在更高的角度上，超出現有的生产技术水平，更广泛地結合着实际。这类問題的解决，常能开辟出新的天地，解决許多部門中的重大問題。对于實驗工作这方面的作用，我們必須加以重視。我們知道，原子能的发现，首先是在實驗室中发现原子核的裂变現象和相应的中子鏈式反应后，才提出制造原子彈和中子反应堆的原理。电子管，半导体三极管等，也都首先是在實驗室中試制成功，发现它的功用，然后才发展成为新的工业部門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論是哪一种情况，實驗研究都起着重要作用。低估了實驗研究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对的。但是，任何實驗室工作总是生产过程的一种近似，一种縮影。即令在第一种情况中，那里有較好的模拟理論，可以保证无誤地放大到一般正常的实际条件中去，但在現場里仍有可能出現在實驗室內所意想不到的“例外”。至于在第二种情况下，局限性又要大一点。因此，科学工作者除了从事实驗研究以外，还必须向生产实践学习，向群众請教。只有把科学家的實驗室活动和广大群众生产实践中的各种各样的試驗活动結合起来，把室內試驗和現場活动結合起来，把单因子的實驗和多因子的現場观察結合起来，才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更完善的方法。这也是我国大跃进的經驗所



证明了的。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我們也必須一面从事实驗研究，一面向群众学习，向实际生产者学习，总结他們的經驗，偏廢任何一面都是不对的。

二、抽象

在科学研究中，把复杂的条件暂时地加以簡化，暂时地撇开那些次要的因素，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人类認識一切事物所必經的阶段。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人們不仅在实验室内簡化实际条件，还常常运用思維的能力，在思維过程中，暂时地撇开較次要的因素，抽象地研究一些典型的“純粹的”形式。这通常称之为抽象法。馬克思說：“在經濟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那必須用抽象力来代替二者”^①。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抽象法是广泛运用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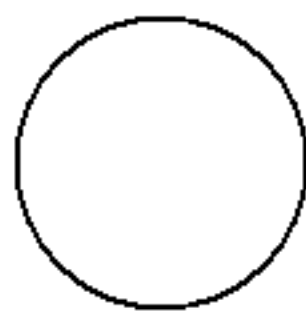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除了运用显微镜和化学試剂外，也运用这种抽象法。因为在实验室内有时有些次要因素还不能完全舍去，物质的形态还不够純粹，因此，人們只好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思維上来实现这种抽象。特别是科学上許多概念和理論，单用实验以及直观的形象是表現不出来的。因此，自然科学里，就常常对一些抽象的理想形态进行研究。例如，数学上研究沒有面积的点，沒有厚度和寬度的綫。力学上研究沒有大小的质点，絕對硬的“理想剛体”，十分柔軟的繩子，沒有摩擦力的滑輪等等。流体力学內研究沒有粘滯性的理想流体，不可压

縮的液体等。化学上研究理想的气体，理想的稀薄溶液。光学上研究絕對的黑体，单纯沿直綫进行的几何光学等等。

所有这些理想形态都是现实世界中所找不到的。在实验室内最多只能近似地接近这种理想情况，但在思維上却可以掌握它。这是抽象法能够补充实验研究的不足的地方。自然科学对于这种純粹形态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在实际問題中，有許多情况和这种理想状态是十分接近的，因而在实践的目的不要求有 too 高的准确度的条件下，对这种純粹形态的研究結果就有直接的用途。例如，在研究炮弹飞行的彈道时，作为第一次近似，我們可以略去它的轉动性能，把炮弹作为一个质点，研究它的飞行軌道。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剛体，要在炮鏡上刻上来幅綫以保持彈头前进的方向。在炮弹飞行过程中，由于空气动力及重力的作用，也会有因彈性变性而引起空气阻力的变化，从而对飞行过程有影响。但这个影响很小，远远要比炮弹出管口速度的偶然变化为小。因此，在彈道学中，通常沒有必要考虑炮弹的彈性性能，把炮弹当作一个剛体就能够滿足需要了。除非我們要研究炮弹如何击穿鋼板，那末，鋼板和炮弹的彈性甚至它們的塑性性能，都成为不可忽略的了。

第二，在研究了理想的事物之后，把理想的事物和实际的事物进行对比，就更容易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頁。



对实际事物进行研究，了解它的规律。

第三，由于在抽象过程中舍去了大量具体材料，因而更能发挥逻辑的力量，从而超越现有条件，预见新事物的出现。

举固体理论的研究为例。在固体理论研究中，常常以没有“缺陷”的理想晶体作为研究对象。应用量子力学对于理想晶体进行计算的结果，发现理想晶体的强度竟比通常金属材料强度大出一千倍。假如我们对这个计算结果深思熟虑的话，便要认为，或者是量子力学理论不适用于晶体，或者是理想晶体这种抽象是没有意义的。然而物理学家们却提出了这种看法：既然理想晶体的强度应该比实际晶体的强度大一千倍，那末，常见的金属材料强度之所以减弱就是因为材料中有许多“缺陷”，假如我们能减少材料中的“缺陷”，那就能大大提高金属材料的强度，从而大大节约金属。实践证明，物理学家们的“预言”是正确的。不久以前，人们制造出若干极细的金属丝，称为“金鬚鬚”，它们有接近于理想晶体的强度。现在，“金鬚鬚”的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由此可见，用理想条件和实际情况加以对比，是能够得出重要结论的。

再以数学为例。数学的特点便是抽象，但是数学的抽象常能作出准确的预言。例如，苏联的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便是按事先算出的轨道而飞行的。它们的计算做得如此之准确，以致于能事先算出人造卫星在何时绕过月球的背面，将月球的“背景”拍摄下来

再传送到地球。数学家们或理论天文学家们利用天文学及力学上已经建立了的规律，把它排列为数学方程式，然后利用这些方程式进行纯数学的演算。在演算开始时，他们固然要用一些物理的思想作为指导，但在演算过程中，却要暂时地撇开事物的质，而只是抽象地考察事物的量的关系，凭借着对量的规律的研究，就能作出某些准确的预言，例如事先算出卫星的轨道。数学的逻辑推演有时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它有时超出现实条件下所能遇到的量的关系。例如，虚数首先是“理性本身自由创造和想像的产物”^①，只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后，才发现虚数在连续介质力学、电工计算、量子力学中有广泛的应用。

抽象所采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物理学和化学上，抽象有时以一种“思想上的实验”的形式出现。在热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中，这种“思想上的实验”有广泛的应用，由它们可得出很多重要的结论。这种“思想上的实验”并不是真正的实验，不能用来检验某一科学原理，但不能认为这就是唯心主义。“思想上的实验”是一种逻辑推理的方法，是在真实的实验的基础上作更深入一层的抽象分析。它不能等同于实验活动，但却以科学实验这种科学实践为基础。通过这种“实验”活动，可以揭露出不同现象间的逻辑的联系，在它的论证合乎正确逻辑的要求时，也能提供给人们以正确的知识。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在热力学上常用一种理想的蒸汽机循环来做这种“思想上的实验”，它的倡始人便是卡尔诺。恩格斯在评价卡尔诺的工作时说：“他研究了蒸汽机，分析了它，发现了蒸汽机中的基本过程并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是被各种各样的辅助过程所掩盖住了；于是他撇开了对这主要过程无关重要的辅助条件而构造了一部理想的蒸汽机（或是煤气机），的确，这样一部机器就像几何学上的线或面一样是决不可能制造出来的，但是它却按照自己的方式作了像这些数学的抽象所作的同样的服务：它表现着纯粹的、独立的、真正的过程。”^① 我们知道，从卡尔诺对于理想蒸汽机的分析中可得出蒸汽机热效率不可能大过某一数值的结论，这个结论已为一切蒸汽机、煤气机以及其他各种热机的经验所证实^②。

抽象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应用得较广泛的。有些人认为抽象活动是一种纯理论活动，是“从理论到理论”，是“脱离实践”。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抽象的思维过程确实以理论活动形式出现，但是科学的抽象却必须以实践为基础，抽出事物发展的主要因素，暂时撇开次要的因素。主要和次要之分必须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在思维抽象活动过程中，常采用推理的方法。推理方法之所以正确，也是以大量实践为基础的。正因为进行推理的前提是由实践得出来的，推理方法的正确性也是由实践证明了的。因此，从形式上看来，科学抽象虽采用了纯理论的形式，

但却决不意味着脱离实践。相反，恰恰是以抽象的形式，更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列宁指出：“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③

列宁在这里对于抽象的作用作了深刻的说明。他在这里强调指出，抽象必须是科学的抽象，科学的抽象才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相反，不科学的、不正确的抽象，就会引导人们走入歧途。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抽象法，如没有抓住主要的因素，或者虽抓住了主要的因素，却对这些主要因素作了不完全正确的概括，那就不能得到科学的抽象。因此，在应用抽象法的过程中，必须谨慎从事，随时听取实践的呼声，不断进行修正。例如，在土壩的设计当中，有些人为了数学上的简单起见，把土堆当作是服从弹性力学的弹性体。把土堆的力学性能当作是服从虎克定律的弹性体，看来是一个较差的近似，它不会完全符合于实际条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0页。

② 卡尔诺原始的工作中，在推导上有错误，但经过修正后，仍可导出热机的最大效率。详见王竹溪：《热力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86页。

③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1页。



件。这种抽象是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实际情况的。应用这种方法来进行计算的结果，就要增多土方，变成一个“胖壩”。当然，这里也得注意到：能设计出“胖壩”，总比不能设计、没有设计好一点。在工程技术实践中，有时会用一些明知不对的抽象来进行工作，这是因为在现有科学水平的限制下，暂时还不能做得更好一点，而由于实际需要的迫切，又不能等待理论完成后才动手。只要不把设计看死了，认识到进行设计的理论的基础有缺点，而在实际工作中加以某些修正，那末，这类方法虽不很好，但总比没有要好一些。当然，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较坏的抽象的水平上，应该进一步研究出切合实际的可行的计算方法。

自然科学研究中抽象法的正确运用问题所涉及的范围是较广泛的，它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这里只对这个问题的某几点作了一些粗浅的说明。总的说来，从形式上说，科学的抽象是离开实际更远一些，但它却根源于实际，在更高的阶段上反映了实际。从具体中来的科学的抽象又要回到具体中去，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回到具体，往往是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我们必须小心地区分不正确的抽象和正确的抽象，并且充分估计到认识过程的曲折性，不可简单地对于正在抽象过程中的尚未最后形成的某些科学理论一笔否定，也不能简单地把科学的抽象运用于实际，或者因为不能这样简单地应用，就否定这种科学的抽象的意义。

三、假說

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抽象，常常由于实践水平和思维能力的限制，并不是一下就可以达到的。因此，在抽象过程中，在某一阶段，科学理论的发展又常常表现为假说的形式。在假说的阶段，认识已经具备了理论的雛型，但它还不够成熟。假说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件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就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那种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的新的说明方式了。更进一步的实验材料便会洗清这些假说，取消一些，修正另一些，直到最后建立起一个纯粹化的定律。如果我们等待建立定律的材料纯粹化起来，那末这就等于说在此以前要停止思想的研究工作，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①

恩格斯在上面这段话里，对于假说形成的背景，假说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假说最后如何根据实验材料而发展为定律的过程作了透彻的说明。假说是探索自然科学理论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阶段。一种理论，当它还在假说的阶段时，所根据的事实虽不够充分，所能解释的事物的现象也还有限，但却是进一步工作所必需的，不应当由于看到某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1页。



些假說所依据的事实还不充分，不系統，并且由于它还常和抽象的邏輯推理連結起来，就断定它是脱离实际的。

假說不仅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里經常出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里有时也要运用假說。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一文里，曾說明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由假說变成了由科学方法证明了的原理。他指出，由于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天才的假說，使得人們第一次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問題和社会問題，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水平，使科学的社会学得以出現。他又指出，馬克思在提出这个偉大的科学假說之后，就着手实际地研究材料，他花了不下二十五年的工夫来研究資本主义社会的材料，并根据大量材料把商品經济体系的活动規律和发展規律做了极詳尽的研究，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密联系的思想，揭示了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自从《資本論》問世以后，唯物主义历史观就不再是假說，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了。

使用假說的方法，并非让人們毫无根据地去玄想。科学假說的建立必須有一些事实材料作根据，或者它是某一已知原理的推广。成为科学的假說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它不能和已知为正确的事实或已由大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論相冲突。如果假說和事实不符或和正确的理論相冲突，那末这个假說就不能成立。

在人們所掌握的事实还不够充分，这些事实的可靠性还不够清楚，或对这些事实的細节以及它的准确程度还不够了解的条件下，根据这些有限的事实有时可以抽象出这种或那种假說，因而就表现为多种假說并存的局面。例如，关于天体演化过程就有好几种不同假說并存。在化学的催化理論上有好几种学說。原子核結構的理論目前就有五种模型之多。在遺傳学方面有两种学說，其一是米丘林的理論，另一种是孟德尔、摩尔根等人的古典遺傳学。在几种假說中也許只有一种假說是对的，但更多的情况却是相互补充。原子核結構理論虽然有五种之多，但有的理論只适用于解釋所謂“滿壳层”原子核附近的一些現象，有的理論只适用于解釋所謂“大变形”原子核。在科学理論研究过程中，有多种假說并存，对于科学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几种假說并存的局面，会通过不断的討論和爭論以及由于新的实验材料的出現而逐步得以澄清。結果或者是以某一种較正确的假說为基础而发展为系統的理論，或者是用“兼收并蓄、融会貫通”的办法形成一种統一的理論，有时是根本地推翻这些假說，另建新的假說。

假說有时以“出人意外”的形式出現，甚至看起来带有若干想像的成分。但是，只要它有一定的事实或理論作根据，不和已知为正确无誤的事实或已由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理論相冲突，即使它带有若干假想或猜想的成分，它仍然不失为科学的假說。对于这类假說，我們不应輕易地加以排斥或否定。在科



學史上頗有一些由這種“驚人”的假說出發而最後得出正確的結果的例子。例如，在量子力學發展的初期，曾有德布洛依提出電子具有波動性質的假說。這在當時看來是十分難以令人接受的“幻想”。而在現在，電子具有波動性已是公認為正確的事實了。然而，德布洛依提出這個假說時，並不是由於他的幻想，而是由於他分析了電子運動的規律性，發現當時所知的電子運動的規律性和光的傳播有許多類似之點。至於光，在當時已經知道它具有波動和粒子的兩重性，因而他便把這兩重性也推廣到電子上而作為一種假說提了出來。

科學假說和科學想像是有區別的。科學想像也要有某種科學根據，但比起假說來，還要不成熟一些，也可以更自由一些。自然科學里科學想像成分較多的一個例子，是在火星上或金星上可能有類似人的高等動物的存在的推測。這一個推測是頗為吸引人的，但這只是一個推測，不能認為有足夠的根據。直到現在，科學的事實既不能證實它，却也不能推翻它。前兩年，蘇聯科學家分析了圍繞火星旋轉的衛星的運動，發現火星上的衛星運動規律，和地球上的人造衛星運動規律有若干相似點，並且這些特點還很難用別種理論來解釋。因此，他提出這樣的假想，火星上的衛星是由類似人的高等動物拋上去的。當然，這個假想看起來也是難以令人置信的，它的證據也不能認為很充分。它的正確與否，要由今后的宇宙飛行的實踐來進一步肯定它或推翻它。但這個假想和現有事實

及理論不相衝突，因此，它和胡思亂想仍是有區別的。在科學發展中，這種有一定科學根據但又不成熟的想像和猜想的存​​在，對於科學發展也是有益的。

當然，必須注意到科學的假說同科學的結論之間的區別。如果把某種假說甚至想像當成就是結論，以此作為生產實踐的指導，那就是有害的了。

假說不僅僅在探討重大理論問題時才出現，它在通常的實際工作中也運用得極廣泛，只是形式略有不同。這通常稱之為“工作中的假說”。例如，一部機器停止了工作，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可能有好幾種。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就常常提出一系列的可能的假說作為指導，再由各種實際試驗來證實或推翻它們。在作理論計算時，假說有時以引進若干假定的形式而出現，然後人們從這種假定的條件出發，試看計算結果是否和實驗結果符合，從而來證實或推翻這些假定。

不論在探討一個重大理論問題或從事解決某一實際問題時，假說這類形式使用得極為廣泛。科學研究的才能常常表現在是否善於提出這種或那種假說來推動科學工作的发展。

有些人把科學的假說和胡適在實用主義觀點指導下的“大膽的假說，小心的求證”混為一談。這種看法是不對的。胡適所提倡的“大膽的假說，小心的求證”治學方法，是以他的反動的實用主義真理觀為基礎的，他的方法論服務於他的真理觀。實用主義者胡適



根本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只是对于实用主义者及其所服务的反动阶级“有用”时，才是他所谓的“真理”。因此，胡适之流在作假设时，只采纳对他有利的“材料”，对他不利的事实就一笔加以抹杀，甚至任意地歪曲、篡改事实，以求符合他所要求的结论。他的假设虽然以大胆的形式出现，但却并不科学；他的证明虽然标榜是“小心”的，但由于他根本否认客观真理，便只能是主观的。

假设的形成是和人们的世界观联系着的。成功的假设一般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中的某些原理而获得的结果。如果缺乏科学的态度，并从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就不免得到错误的假设。这类假设对于科学的发展往往不起推动作用，反而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入迷途。例如，天文学上有些主张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提出若干宇宙如何形成的“假设”，如宇宙膨胀论，其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这类假设，在哲学上固然是错误的，在科学上也缺乏根据。这类假设，我们是反对的。

* * *

以上我们分别讨论了实验、抽象、假设三种科学研究方法。在使用这三种研究方法时，重要的是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指导。实验的安排总是为了解决一定的实际问题，按照实际问题的要求来设计的。抽象法运用得正确与否，其前提是必须不断和实际情况相比较。假设也必须由新的实验事实

来检验、校正、丰富和发展。因此，在这三种科学方法的运用过程中，必须紧密地联系着实践。其次，是必须运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全面地估计实验、抽象、假设在认识中的作用。假如只重视劳动生产经验的积累，而不重视实验研究，只重视掌握具体事物的具体知识，不重视进行抽象和概括，只重视收集各种实验材料，实验数据，而不重视理论的分析，不重视逐步地总结为科学的假设，那末，就将流于经验主义的错误，阻碍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假如把实验室活动看作是唯一的推动科学前进的实践形式，把抽象方法中对某些客观条件暂时地撇开和相对地割裂看作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把假设的形成和提出，看作可以是和实验无关的，那末，就会犯唯心论的错误。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① 在我们使用实验、抽象、假设这三种方法时，必须特别记住列宁这一个原则性的意见。

^①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1—412页。



关于百家爭鳴的一个問題

黎庶之

为了学术的进步，应当开展百家爭鳴，鼓励在同一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的爭論，这点是大家都同意的。有人說，要参加某个問題的学术討論，必須掌握有关的充分知識，在人們的“本錢”不够的时候，就不会有有益的討論，所以百家爭鳴能否順利展开，有一个关键問題，就是人們的“本錢”够不够的問題。另外也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們觉得，如果这样提，就会妨碍百家爭鳴，就会使有些尚未成为专家的人自餒，不敢积极参加学术討論，也会使有些专家获得一个借口，拒絕考虑和接受別人的意見。这两方面的看法到底是哪一方面对呢？看来，恰当地理解這個問題，对于更好地开展百家爭鳴，促进科学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有成果的学术討論总是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进行的。人們在某一問題上具备了必要的理論知識和实际知識，才有可能对于解决這個問題作出自己的貢獻。

每一个学术問題的討論，都不是凭空出現的，总是因为有一些人对這個問題做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見解，才展开了討論。在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中，有些并不是今天第一次出現，过去已經有不少人在這樣的問題上進

行过爭論，得到了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人們如果不先了解先前的研究成果，要提出对于当前的爭論有益的見解，是很不容易的。在学术討論中要提出真知灼見，就要認真接受前人所創造的知識积累，接受同时代人在知識积累中新增加的东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繼續努力。

学术討論所涉及的問題，常常是比較复杂的，要搜集大量的可靠的材料，从許多方面經過反复研究和探討才能够弄清楚。仅仅依靠一时的感想和偶然的“灵机”，是不可能得到科学的結論的。

有些普通的工人农民能够在某一个問題上提出很好的意見，补充或糾正了某些专家的意見，这样的事实的确是常有的。但这并不能証明，沒有必要的知識准备也能发表真知灼見。这些普通的工人农民，在这一个問題上，有长期的經驗，有充分的实际知識，就这一点說来，他們是有學問的，而不是沒有學問的。他們的學問是从他們的生產實踐和生活實踐中得来的。有些专家，虽然有某一方面的學問，但是因為他們實踐經驗不够，他們的知識是不完全的，因而就能从有經驗的工人农民的意見中得到好处。所以



这里恰恰证明了，有价值的意見总是在必要的知識准备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当然，缺乏实际經驗的专家只要努力，也可以补足自己的缺陷，为此就要不辞辛勞地去进行調查研究，下功夫去学习实际知識，虛心地向普通工人农民学习。在学术史上，这种历尽艰辛跋山涉水去搜集实际材料、訪問群众的事例，并不是很少的。

所謂學問，无非是知識和經驗的积累。人們經過各种途徑所取得的有用的學問，都应当受到尊重。提倡百家爭鳴，当然不是輕視學問，而正是为了使人們从各种不同途徑取得的有用的學問都能提供出来，成为社会的公共財富。

目前我們的学术界，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和不断提高的，然而也确有研究不够，理論知識和实际知識准备不够的情况。我們的学术討論是有成績的，然而也确有泛泛而談，在概念上繞圈子，不注意掌握有关的理論知識和实际知識，盲目摸索的情况。由于知識不够，學問不够，因而提不出有科学价值的見解，这样的情况，如果存在着，就应当努力加以克服。支持和鼓励人們刻苦地学习知識和增加學問，对于提高学术研究水平，开展学术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是完全必要的。

这样的提法会不会妨碍百家爭鳴，使一些人不敢参加学术討論呢？提出这种顾虑是有某些事实做根据的，我們应当看一下这些事实。

的确，有这样的专家，他們拿學問的招

牌来吓唬人，不願意傾听在他看来學問不如他的人的話。他們不知道他們虽然有較多的學問，但是有些方面是他們的知識所不及的，而且在他們的专长中也未始沒有某些缺陷。而总的說來學問不如他的人，也可能在某一點上，學問超过了他們。

也有这样的人，他們虽然在某个問題上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見解，但是由于他們的一般理論知識和实际知識准备較差，因而对于自己的見解沒有多大把握，也不能給以充分的科学的論証，所以他們不敢提出自己的意見。对于他們，应当給以鼓勵，使他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見，同时也应当使他們努力提高自己的必要的理論知識和实际知識，以便使他們的見解更加科学化和系統化。

一方面，使有學問的人更加謙遜一些，同时也使他們的學問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并且能够繼續增长起来；一方面，使學問較少的人能够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同时又积极努力提高自己，使自己在討論中和研究中一步一步地充实起来。这是在学术界的百家爭鳴中應該出現的气象。有了这种气象，我們的学术界就能不断地繁荣发展。

所以，正确地理解学术討論应当以充分的研究为基础，并不会起消极的作用，而只会起推动我們的学术討論和学术研究的作用。

学术研究和学术討論是互相促进的。在百家爭鳴中，通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开始是一些人在学习和研究中，提出了問題，发生了爭論；随后是由于爭論的展开，推动着更多的人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从各



个不同的角度和各个不同的方面，提出更多更好的見解，互相增益，互相补充，互相糾正。所以我們的学术討論是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学术討論又反过来起着促进学术研究的作用，使大家的知識水平和科学水平不断提高。

在学术討論中，要求有系統的研究和充分的知識，这并不排斥一得之見。“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这一得之見实质上并不是什么偶然的灵机，或者是什么脱离实际的冥想的結果，而是由于有了长期經驗，再加上“千慮”那样一种思想劳动，才出現了一种真切的見解。这一得之見，仍然是認真学习和研究的結果，仍然有一定的知識根基。靠偶然的灵机来做學問，总是不行的。一得之見同系統性的研究，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科学研究者往往在长期积累的知識的基础上得到了一得之見，又在这一得之見的基础上进行系統性的科学研究。这样起伏前进的思想发展的情况，在許多科学研究者的工作进程中都可以找到。隨着百家爭鳴的开展，这种一得之見和系統研究相互启发的情況將更多地出現。

在学术討論中要求充分研究和有充分的知識，也并不是說，只有某一行的专家才能参加某一行問題的討論。学有专攻，同时各門學問又有联系。一門學問的討論，往往不能不涉及到其他許多門學問，研究其他有关各門學問的人当然都能够提供意見，也需要提供意見。而研究有关各門學問的人，其所以能对一个共同有关的問題提供有益的意

見，还在于各自都有比較專門的研究。这种情形，在各科医生的会診中，人們常常可以看到。

知識是无穷尽的，人們任何时候也不能說自己所拥有的知識已經足够了。但这当然不是說，既然知識永远是不够的，所以永远不能发表意見。一方面，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总是不断地要求人們掌握新的知識，而使那些故步自封的人只能落到后面去。另一方面，在一定时候为研究某一个問題，人們至少必須掌握哪些知識，这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有了这些知識，人們在这个問題上就有了发言权；反之，不具备这些必須具备的知識，那就难免主观臆測、夸夸其談了。

既然在討論中有不同的意見，当然有些意見是不正确或不完备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們不要努力提出正确完备的意見，也并不意味着发表意見不需要充分准备和認真从事。因为認真并不等于一定正确，允許有錯誤也不等于可以輕率。沒有必要的足够的知識，就沒有发言权，这种說法的重点是在于推动人們更多地学习知識，而不是要人們不发表意見。知識不够，当然也可以发表意見，但是經過大家的討論，得到了正确的看法，最后还是証明，不以充分的科学知識为基础，妥当的結論是达不到的。在学术爭論中应当創造条件，促使正确的意見代替不正确的意見，使不完备的意見完备起来，而不能在已有的水平上停滯不前。学术討論本来也不只是要求人們把已有的知識表現一



下，重要的是要有所提高，有所发展。所以，应当鼓励人们积极努力，认真学习，刻苦研究，继续不断地去取得知识，始终把学术讨论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迈着踏实的步子勇敢地向前走。

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九月，在《反杜林论》新版的序文中，有几段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话，对我们很有启发。恩格斯认为，研究和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有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他曾经在八年中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这种研究上。正在他进行这种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需要批判杜林的所谓自然哲学的情况，他勇敢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由于他当时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还不成熟，所以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在他的著作中，举出了正确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去与他的论敌的谬误和歪曲的断言相对抗。因此，在他的著作发表以后的八年中，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人能指出我与当时所知事实不符的真正的错误，或者对于当时公认的理论的不正确的叙述”^①。

列宁在一八九九年六月写给亚·尼·波特列索夫的一封信中，有一段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来理解这个问题。列宁在那封信中提到，当时的新康德主义激起了他的愤怒，他“忍不住”地在《再论实现论问题》的文章中，顺便地简要地批判了一下新康德主义。为了进一步进行系统的批判，他决定沉下心来对哲学从事更加深入的研究。他这样说：

“我说‘忍不住’，因为我很清楚地意识

到自己的哲学修养差，在我没有多多学习以前，我不打算就这些题目写文章。现在我正在这样做，我先从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研究起，然后准备转到康德。我已弄到了最主要的哲学名家的最主要的著作，但没有新康德主义的作品（我只订购了朗格的著作）。请告诉我，您和您的同志们是否有这类书，能否借给我用一下。”^②

列宁的这种态度是严格的科学的态度。在他写《再论实现论问题》的时候，虽然他的理论修养已经使他能够判定那种“用新康德主义丰富马克思的理论”的倾向的谬误，但是他认为，为了认真地对付新康德主义，还必须努力占有更多的知识，进行更系统的研究。不但要系统地了解新康德主义本身，还要系统地了解它的源流。列宁这样努力研究的结果，在一九〇八年终于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那样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

列宁的做法告诉我们，争论一个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不能只满足于一般的知识，而要积极努力，依靠刻苦的学习和研究，取得更多的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那种坚持不懈地去搜集、整理大量的现实材料和历史材料，总结群众的经验，接受有关各门科学的研究成果的认真严肃和生气勃勃的态度，是我们永远需要学习的。

① 《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② 《给亚·尼·波特列索夫》。《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页。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一个材料的调查

——光緒九年商人祝大椿是否在上海创办了“源昌机器五金厂”？

· 謝 商 ·

编者按：本文原载上海《学术月刊》1961年第5期。本文的作者在整理上海机器工业史料时，对一向被认为我国早期民族机器工业中创办最早、规模最大、资本最巨的“源昌机器五金厂”的材料，发生怀疑。通过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作者判定，这个“工厂”是商人祝大椿为了骗取清政府的官銜而虚构出来的。本文作者不仅校正了一个重要的史料，更重要的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了一种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对于可疑的材料，不是轻轻放过，而是认真地进行分析，进行必要的调查，从而弄明了事实真相。《学术月刊》在刊登这篇史料调查报告时，加了编者按语，对作者在调查研究中的态度和方法，表示赞许。本刊在转载此文时，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删节。

许多近代经济发展史和近代工业史书籍都以“光緒九年商人祝大椿在上海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资本十万元”一节，作为我国近代工业产生时期的一则重要史实。我们在调查整理上海民族资本的机器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史料过程中，发现这个记载是事实完全不符的。

“源昌机器五金厂”，长久以来，被认为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的机器工业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早、资本最巨，在当时能制造各种机器的工厂，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这个厂的记载，最早发现于光緒三十四年编制的《农工商部统计表》下函第五册，第四十页：

“源昌五金工厂”。营业，专做五金。出资人，祝大椿。资本十万元。”

解放以前，在许多经济著作和近代工业史、实业志之类书籍中都有所载录，例如：

“源昌机器五金工厂：资本100000元，业主祝

大椿。〔所在地〕上海。〔设立于〕光緒九年。”（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调查部《支那经济报告书》第31号附录，第5页）

“自五口通商以后，上海等处，即有外人所设之机器厂。国人自营之厂，则以光緒九年商人祝大椿在上海所设之源昌机器五金工厂，规模稍大。”（吴承洛编：《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册。1929年2月商务印书馆版，第266页）

其他作同样引录的有龔駿编的《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杨大金编的《现代中国实业志》等。

解放以后出版的许多近代经济史和近代工业史书籍，也作了同样引录，例如：

“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商人祝大椿在上海创办源昌机器五金厂，资本十万两。造各种机器。商办。”（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第226页。《新政》第2期，1947年2月延安版，1953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版）

“一八八三年，上海商人祝大椿筹资十万元，

* 在同书中别的地方，又称为源昌机器五金厂。



在上海設立源昌機器五金工廠。”(孟宪章著:《中國近代經濟史教程》,1951年9月中華書局版,第62頁)

“買辦商人祝大椿在1883年創立的源昌機器五金廠,有資本十萬元,規模較大,能製造某些機器。”(湖北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講義》,1958年1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237頁)

其他如吳杰編的《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汪敬虞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也有相同資料編入。

我們在研究“源昌機器五金廠”的史料的時候,從已有的各項記載或引錄中,首先發現兩個疑點:第一,關於“源昌機器五金廠”的業務問題,最早的記載(《農工商部統計表》)是“專做五金”。稍後的記載,則並不涉及它的營業範圍,只是後來某些近代史著作上始有“造各種機器”字樣,或轉相引伸為“能製造某些機器”之類。但是,“五金”和“機器”的範圍顯然不同。第二,關於源昌機器五金廠的資本問題,《農工商部統計表》所列的資本,系農工商部成立後登記的。祝大椿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將“源昌機器五金廠”和他所創立的其它企業同時登記,其資本額應是一九〇七年時的實有資本,而並非一八八三年的創立資本。

儘管不少經濟史都有關於“源昌機器五金廠”的記載或引錄,但都是三言兩語,對於廠址、製造內容、創立經過、發展情況等,語焉不詳,而且存在着若干疑點。為了進一步弄清楚“源昌機器五金廠”的面貌,我們開始進行調查訪問。

在訪問之前,我們研究了“源昌機器五金廠”創設時的客觀經濟背景。一八八三年,

上海官僚資本企業江南製造局,在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下,開始擴大軍火生產。外商船廠在這一時期逐步走上壟斷的道路,控制着整個上海的船舶修造業。為帝國主義侵略服務的“租界”公用事業,相繼建立。這時,其他的近代工業,如蠶絲工業尚處於萌芽時期,紡織、面粉等輕紡工業,則尚未開始建立。在這樣的情況下,從當時的銷售條件看,民族資本的機器工業的生產經營,較大的可能是依附外商進行船舶修理以及製造內河航運需要的小火輪等,製造其他機器的可能性是較少的,因而可以從訪問歷史較久的船廠找到線索。其次,按照“源昌機器五金廠”的資本有十萬元來說,則無論在一八八三年或一九〇七年,在上海民族資本的機器工業中應當是數一數二的,一般老年工人必然熟悉。因此,我們首先訪問了前英商瑞鎔船廠老工人七十六歲的孫祖恩同志、七十歲的李福生同志、八十一歲的錢仁道同志等,他們對於一九〇七年前後上海的機器工業,特別是船舶修造機器工廠,都非常熟悉。但是出乎意外,他們異口同聲地都說不知道“源昌機器五金廠”,也沒有聽見別人談起過這個廠,更沒有遇到過一個從“源昌機器五金廠”出身的老師傅或學徒。我們又訪問了一八七〇年創設、一九〇〇年左右發展起來的另一個機器船舶修理廠——建昌銅鐵工廠的六十三歲的廣東籍老工人文發同志,他在回憶中談到了不少一九〇七年左右存在的機器工廠如建昌、遠昌、合昌等廠的情形,但是對於“源昌機器五金廠”卻沒有絲毫印象。

後來,我們又訪問了在一九〇六年設立的萬昌機器廠私方八十三歲的趙孝林老先



生，他曾做过多年上海机器业同业公会的前身钢铁公所理事长，对同业非常熟悉。但是在他从一八九四年学业开始到一九〇六年自行设厂和以后若干年月中，没有听说过祝大椿曾设立“源昌机器五金厂”。其他机器厂的私方如八十岁的孙荣泉先生和陈芝生先生等，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工厂。从上海机器同业公会的史料中，也查不到有关“源昌机器五金厂”的记载。

这样，我们对“源昌机器五金厂”究竟是否存在过，开始发生了怀疑。

为了进一步深入调查，我们又找到了祝大椿所创办的第一个企业——专营煤铁五金的“源昌号”的老年职工七十岁的朱宝祥同志。据他回忆证实，自一九〇六年他进“源昌号”当学徒起（当时“源昌号”已开设二十年左右），资本家祝大椿并未另设“源昌机器五金厂”，也没有听说以前设立过。如果祝大椿另设有“源昌机器五金厂”，则该厂所用钢铁煤炭五金，必向自己设立的“源昌号”采购无疑。当时“源昌号”同其他机器厂颇多往来，就是从来没有同“源昌机器五金厂”有过交易。

根据上列访问结果，我们初步得出一个结论——祝大椿曾设立“源昌号”，而“源昌机器五金厂”是“子虚乌有”的。为了完全肯定这一结论，我们最后又访问了祝大椿的次子七十岁的祝伊孚老先生。据他介绍：他的父亲一八五五年生于无锡，一八七二年来上海，在旧铁行中习业。在一八八五年左右，才由他母亲多方拼凑了大约一千元资本，开设“源昌号”，经营煤铁五金，这是他父亲所设立的最早的企业，他的父亲就是以此起家

的。一九〇〇年前后，他父亲做了怡和洋行买办，又先后设立了碾米厂、面粉厂、丝厂、纱厂、电灯厂等企业，但是从来没有办过机器工厂。据他说，在一八八三年，他父亲一无资本，二无技术，根本不可能设立机器厂。

经过上列访问，从祝大椿的出身及其起家经过，证明祝大椿在一八八三年不可能有十万元资本，他所设立的早期的企业，只有经营煤铁五金的“源昌号”，没有“源昌机器五金厂”，从而推翻了被一般公认和普遍引用的这个虚假的历史资料。

除了访问以外，我们又从其他方面来佐证上列结论。首先我们查阅了当时的报刊。在一八八三年，上海已有《申报》、《捷报》等几种报刊出版，对于当时各项工业的动态，经常有所报道。例如在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四年间，《申报》和《捷报》多次记载过“发昌机器厂”等工厂制造小火轮的生产情况，内容生动翔实。发昌机器厂是一个从二百两资本发展起来的规模较小的民族资本的机器工厂，当时报刊尚且如此重视，岂有对同时期一八八三年设立的、拥有资本十万元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反而没有片言只字记载？此其一。再从同业对比来看。我们把“源昌机器五金厂”和同时期设立、资本相似、同样由买办创立的机器工业“求新机器制造厂”来作一个比较。“求新厂”在一九〇七年已是拥有厂地七十亩、厂房数十间、机床数十台、规模巨大的工厂，一开始就能制造三百吨轮船和引擎、榨油机、泵浦等机器，不数年，就发展成为闻名上海的最大的民族资本的机器工厂。岂有十万元巨额资本设立的“源昌机器五金厂”，厂址既无着落，又没有机器产品问世，在上海



默默无闻之理？此其二。再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一八八三年中法关系紧张，因为传闻法军要进攻上海，上海市場上曾經发生严重的混乱，胡光墉、金蕴青等富商相继破产，钱庄商舖倒閉的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拿出巨資来設厂，似乎也不大可能。此其三。

总之，从訪問經過，报刊記載，同业資料中，都有力地否定了“源昌机器五金厂”的存在。

然而，各种书籍所引为唯一根据的清《农工商部統計表》上所列祝大椿設立“源昌机器五金厂”一事，是如何发生的呢？經過我們調查，发现“源昌机器五金厂”完全是祝大椿別有企图的虛构。

原来，在一八九五年中日“馬关条約”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資本輸入的經濟侵略加深，引起朝野設厂自救的呼声，清政府也頒布一些奖励民間設厂的章程和規定，其間虽然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但是“推行实政”的政策，在当时的客观形势下也不得不繼續进行。一九〇三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門設置商部，奏定商律和公司注册章程，以及奖給商勛章程等，一九〇六年改为农工商部后，一九〇七年奏定“华商办理实业爵賞章程”，其中載有：

“第一条：凡商人無論独资、合资、附股营业，应得爵賞，即以个人資本之大小，所用工人之多寡为差。

第二条：此项爵賞，总以所办实业，能开辟利源，制造貨品，扩充国民生計者为合格，其仅以販运周轉，汇兌营利为业者，不在此列。

第三条：应得爵賞等差列左：……十、資本百万元者，拟請特賞四品卿銜，逾二百万元者并加二品頂戴。……”（《大清光緒新法令》，第16册，第10类，“实业”，第49頁）

祝大椿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申請”。有文件为证：

“祝大椿，道銜，上海商务总会議董，錫金商务分会总理。独资創辦源昌机器碾米厂、源昌机器繅絲厂、源昌机器五金厂，合资創辦华兴棧机器面粉公司、公益机器紡織公司、怡和源机器皮毛打包公司，共計所出資本在二百万元以上。光緒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本部专折奏獎，奉旨特賞二品頂戴。”（光緒三十四年編：《农工商部統計表》，下兩第六册，第17頁）

祝大椿向农工商部登記他有关的企业和农工商部賞予二品頂戴，都发生在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据《光緒政要》記載，祝大椿的全部个人資本，剛好是二百〇一万元，剛够二品頂戴資格。这样，事情便极明显：第一，投資的數額是湊出来的；第二，祝大椿将他首先創立的“专做五金”的“源昌号”，改为“源昌机器五金厂”，張冠李戴，掩人耳目，弄虛作假，以便騙取清政府賞給官銜。因为按“章程”第二条，給賞只限实业，商业是不算數的。而且当时的“源昌号”确实經營五金鋼铁业务，間或拆过旧船，出售廢料机器，这样，“号”与“厂”是很容易蒙混过去的。

这一点，《商埠志》也是有力的佐证。《商埠志》是一九〇八年出版的，同祝大椿登記时相差只有一年，其記載比較可靠。《商埠志》在記錄祝大椿的所办企业中，沒有涉及“源昌机器五金厂”，只有“源昌号”为祝大椿所办的最早的企业。这更足以证明祝大椿在登記时故意混淆，使原来专营五金的“源昌号”成为“专做五金”的“源昌机器五金厂”。这样，祝大椿用冒名頂替的办法，向农工商部登記，終于騙得了二品頂戴的官銜，但却造成了一个无中生有的历史假象。



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的真相

廖原

南斯拉夫铁托集团实行所谓“企业自治”有十年多了。他们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把原来属于国有的工矿、交通运输、贸易、农林、公用事业等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的企业交给各企业的所谓“劳动集体”（通过“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去“独立”地进行管理。各企业可以根据市场上的供求情况，任意确定产品的产量、品种和价格，自己采购原料并在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利润和工资的分配办法，自负盈亏。

铁托集团的这种经济政策，有它自己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它的经济职能在过渡时期要消亡的修正主义理论。铁托集团诬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官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是“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宣称，国家的经济职能应当立即开始消亡，而代之以所谓“更高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关系”和所谓“真正的经济民主”。据他们说，“企业自治”就是这种“更高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关系”和“真正的经济民主”，是什么“有关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铁托集团的这种经济政策，是由他们的总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这条路线就是使南斯拉夫整个社会制度向资本主义蜕化的反动路线。

铁托集团一向把这一套修正主义的货色，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铁托在去年十一月发表的纪念南斯拉夫建国十五周年的文告中，说他们实行“企业自治”，“对总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南斯拉夫经济的实际情况，却无情地给了铁托集团的耳光。

事实上，铁托集团的所谓把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只是让企业的少数领导人来操纵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至于广大的工人群众，不要说管理企业的权利，就连自己的工作权利也常常被无理剥夺。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伏克曼诺维奇曾供认：在南斯拉夫的企业中，不但存在着“官僚主义关系、裙带关系、贪污受贿”等等黑暗现象，而且很多工人只是因为批评了企业领导人，就被企业领导人“从企业中赶出去”（一九六〇年一月在南工会会议上的报告）。铁托本人在一九五九年六月的一次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在企业领导人看来，“把工厂企业交给工人管



理只是理論上形式上的东西”，“实际上在那里作主的是个人”。

在企业收入的分配上，也清楚地表明了所謂“經濟民主”的虛伪性。确定分配标准的工资条例，是由企业中的少数领导人制定的，工人无权过問。据南斯拉夫报纸报道，一九五九年各企业在制定新工资条例时，企业领导人都趁机给自己多增工资，他們工资增长的幅度大大超过了工人工资的增长幅度。有的地区，經理增加的工资几乎等于两个熟练工人的全部工资，有的部門只增加了少数领导人的工资，沒有增加工人的工资。企业的领导人除享有高额的工资外，还享有用企业公款到国外旅行、多分奖金、多拿补助工资等特权，因此，他們的实际收入大大超过了他們名义上所得的工资額，可以享受特別优裕的生活。

铁托集团的“企业自治”的实质，就是把追逐利潤作为企业經濟活动的最高准则，把所謂“經濟刺激”作为推动企业經濟活动的唯一动力，鼓励資本主义的經營方式，提倡强者打败弱者、大魚吃小魚式的資本主义的自由竞争。

在铁托集团的“企业自治”制度下，哪个企业能在市場上打败竞争对手，获得更多的利潤，就是經營得“成功”的企业。在南斯拉夫，企业之間勾心斗角，排挤傾軋，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企业之間的剧烈竞争，对生产造成了人为的損害。如“伊沃·洛拉·里巴尔”、“丘罗·甲科維奇”与“耶金斯特沃”三家机器制

造厂，一九五九年共同承包了为五家制糖厂制造设备的业务。这三家工厂都想从中捞到最大的利潤，在如何分配任务的問題上爭执了半年之久，結果推迟了制糖设备的生产，使五家糖厂不得不晚一年开工。企业之間由于害怕对手的竞争，互相保守自己的营业秘密，拒絕傳授技术。如南斯拉夫《战斗报》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报道，日列尼亚宁“无产者”地毯工厂开工已有两年，由于沒有掌握織长毛絲絨的技术，一直不能織出合乎規格的长毛絲絨。这个厂請求留布里雅那的裝飾品織物工厂允許他們派工人去实习，或进行生产协作，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絕，以至于不得不派人到外国工厂去实习。在原材料供应部門和加工部門之間的关系方面，由于供应部門不擇手段追求利潤，时常故意提高价格、供給次貨、拖延供应或拒絕供应，这样就使加工部門不能完成生产計劃，甚至被迫停工。南斯拉夫《消息报》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报道：南斯拉夫的造船企业同它的数百家合作者进行合作“有着特別的困难”，因为后者对它供应原料和再加工材料时常发生“供应得晚、质量不合格、价格高”等情况，以至使“奥巴底亚”号輪船推迟了一年才下水。薩格勒布一家工厂約有价值一亿第納尔的产品“被冻结”，因为它的合作者沒有及时供应零件，直到該厂同意后者提出的“极高的价格”，这才把零件送来。今年一月十一日和二十四日的《战斗报》报道說：“維德姆·克尔什科工厂停止了标准卷筒紙的生产，因为沒有紙浆木材。”木材生产者虽然存有大



量的紙浆木材，但是为了等待更高的价格，“硬不出卖”，因而这家工厂“还不知道何时才能继续生产。”《消息报》說，供应原料和再加工材料的部門在南斯拉夫处于特权地位，那些依靠它們供应的加工部門无可奈何地表示：即使是它們拖延几个月供应，供应次貨，“我們也不得不沉默”。

剧烈的竞争，在交通運輸部門、商业部門和对外貿易部門内部以及各經濟部門之間也普遍展开着。同一条公路運輸綫上，往往几家汽車公司各設車站和票房，票价各有高低，各自招攬生意。海外運輸也有类似現象。如在一条通往美国的海運綫上就有两家輪船公司营业，其中一家用减少中途停船站、縮短航行時間等办法搶另一家的生意。在商业部門中，同一个地方的各家商店在出售同一种商品时，为了爭夺顧客，会有不同的价格。南斯拉夫的許多企业都自营进出口业务，它們也常在国外市場上互相搶生意。据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周报报道：“塞爾維亞汽車公司”曾以每部卡車八千美元的出口价格和一家外国公司簽訂了合同，而“南斯拉夫汽車公司”却以每部便宜五百美元的出口价格把生意夺去。为了获得高額利潤，商业部門不惜从外国进口那些本国工业部門也能供应的工业产品，并且想办法在市場上排挤本国产品，搶本国工业部門的生意。在工业部門和商业部門之間，甚至还演出了在报上登广告、在电台广播和散发傳单互相攻击的丑剧。如生产縫紉机的巴卡特工厂散发傳单說：“由于不正当的原因，本国

的工业品，甚至那些质量最好的，往往被攻击为质量不好的，而把坏的进口商品硬塞給公民們”；“我們的大部分商业网不仅丑化我們本国的产品，而且过分地不公正地贊揚进口的縫紉机”。傳单攻击某些商业企业所經售的进口縫紉机是“三等貨”、“机器結構陈旧”、“工作时响声很大”、“沒有后备零件”，吹嘘自己的产品是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家意大利縫紉机工厂的式样制造的，“质量是縫紉机生产的技术成就的最高峰”。受到攻击的商业企业当然不甘沉默，紧跟着在报上登广告，反唇相譏。

不擇手段，用損害別人、使別人倒臺的办法，达到賺錢的目的——这本来是資本主义社会中慣常的現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各个企业在国家的統一领导下，以人民的利益为原则，通过有計劃的合作和友誼的竞赛，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比資本主义制度优越的鮮明标志之一。这也正是铁托集团的“企业自治”制度所不可能有的东西。

在铁托集团的“企业自治”制度下，許多企业为了牟取暴利，在市場上狂热地进行投机活动，兴風作浪，哄抬物价，損害整个社会的利益。一九六〇年六月五日南斯拉夫《新聞周报》报道，由于国家增加了对建筑工程的投資，于是，投机活动的狂热“席卷了建筑材料市場”，“机灵的商人认为做好生意的时刻到了”，許多企业搶购、囤积建筑材料，造成市場上建筑材料奇缺的現象。生产部門立即乘机抬高价格，商业部門也跟着加价，



結果使木材的价格猛漲一倍至一倍半，鋼筋的价格也漲了三分之二。一些从来沒有經營过这行生意的企业也插手进来“混水摸魚”，開設建筑材料“代理行”，“它們通过一些中間人，往往是在電話中会談后，就能获取高額利潤”。前几个月，南斯拉夫物价飞漲，企业紛紛趁机大搞投机活动。《战斗报》在今年二月七日的题为《混水摸魚的人》的評論中透露：“搞价格投机”的企业的“名单相当长，而且正在增加”。

企业之間互相傾軋、損人利己的斗争的尖銳化，突出地表现在經濟糾紛不断增多的事实中。南斯拉夫报刊公布的材料表明，这个国家經過經濟法院处理的經濟糾紛案件是逐年增长的：一九五三年十万六千多件，一九五四年十六万七千件，一九五五年二十一万三千件，一九五六年二十七万八千件，一九五七年近二十七万件，一九五八年近三十四万件，一九五九年更增加到三十八万件。仅一九五九年一年中，貝尔格莱德的“乃依馬尔”和“劳动者”两家企业即各被控告五百多次，新貝尔格莱德的拖拉机工厂和日列茲尼克的“伊沃·洛拉·里巴尔”工厂的負責人各进过二百多次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大大地不够用了。在貝尔格莱德，一个法官每月要处理二百个案件，“远远超过了定額”。許多企业为了打官司而支付大量的費用，仅塞爾維亞共和国的建筑企业在一年中就为此开支了二亿五千多万第納尔的巨款。一九六〇年五月以来，铁托集团为了緊縮通貨，停止发放企业流动資金貸款，使企业普遍出現了資金

周轉的困难，債務糾紛大大增加。南斯拉夫《政治报》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二日报道：南斯拉夫最大的鋼铁企业澤尼查鋼铁公司由于人欠的債收不回来，欠人的債还不出去，“流水賬已被凍結了几个月”，“那些向它供应原材料的营业对手已取消了某些定貨”，“供应耐火材料和铁合金的企业”“拒絕了供应”，企业的生产处于严重的“危机”中。該企业向法院控告了二百多家企业，停止向六十家企业供应貨物，并拒絕同那些不能偿付債務的企业簽訂繼續供貨的合同，但是，“这一切沒有使情况有較多的改善”。

铁托集团在一九五八年頒布了一个“經濟联合法”，規定企业可以組織“业务联合会”，“共同生产一定的产品和共同銷售”，“共同购买原料和材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行委員米·馬林科供认，这种“經濟联合”是“模仿資本主义把資本集中在壟断的康采恩和卡特尔中”。据铁托集团說，这样可以“給一切不健康的竞争、胸怀狹隘的观点、地方主义的利益关上大門”。大家知道，在现代資本主义国家里，由自由竞争走向壟断，并不能消除竞争，只是使竞争在新的基础上更剧烈地展开。南斯拉夫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如烟草业的八家烟草工厂和近四十家烟草加工品批发商在一九五九年組織了一个“业务联合会”，确定参加者只能通过这一“联合会”的商业机构获得原料，銷售产品，并且确定了每个参加者的生产規模。結果，使三家沒有参加“联合会”的烟草工厂受到严重的排挤，它們的产品只能在馬其頓一地銷

②



售，在其他地方就不能銷售。建立壟斷組織還給某些企業帶來更高的利潤，給消費者增加更多的負擔。如八家電器批發商同無線電生產者成立了“業務聯合會”，包購了後者在一九六〇年所生產的全部收音機，與此同時，他們確定把收音機的市場零售價格提高百分之五。

鐵托集團一貫吹噓說，實行“企業自治”，可以最好地發展生產，可以造成任何“國家監督”和“行政干涉”所不能有的推動生產發展的力量。南斯拉夫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在鐵托集團的統治下，南斯拉夫的經濟已經愈來愈從屬於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美國、西德、意大利等國的商品充斥南斯拉夫的市場，使南斯拉夫的本國工業遭到了愈來愈強烈的打擊和排擠。南斯拉夫很大部分工業企業實際上成了外國資本主義壟斷企業的附屬裝配車間，它們依靠購買仿製這些國家工業產品的許可證並從這些國家進口半製成品和零件來進行生產。《戰鬥報》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一篇文章曾悲嘆南斯拉夫的工業是“沒有發明家的工業”，“滿足於按外國許可證生產”的工業。鐵托集團所經常吹噓的南斯拉夫工業的增長數字，很大程度上是靠帝國主義的投資和從外國進口半製成品或再加工材料來維持的。南斯拉夫報刊透露：一九六〇年頭四個月中，“發展速度最快”的電機工業，大部分產品是靠增加進口再加工材料和零件生產的，並認為“這一情況也適用於其他部門”（一九六〇年五月二

十四日《戰鬥報》）；在馬達和馬達車輛工業部門，一九五八年的三千六百五十萬美元總產值中，進口的零件和原料的價值就占一千六百五十萬美元，即占總產值的百分之四十五（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共產主義者》週報）；製藥工業各工廠“大部分都是加工進口的藥材，或者僅是改換藥品的包裝，而只在極小的規模中生產本國的藥品”（一九六〇年三月八日《戰鬥報》）。大量進口造成了對外貿易上的巨大逆差。對於這種逆差，鐵托集團完全要依靠向帝國主義國家乞討“援助”和貸款來平衡。每當外匯發生困難時，這些依靠進口再加工材料進行生產的企業就要減產、停工甚至倒閉。

在南斯拉夫這個鐵托集團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中，經常存在着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商品“過剩”、企業倒閉和大批工人失業等現象。在這個國家里，儘管廣大勞動人民生活水平很低，但同時却有大量商品“過剩”。企業普遍用賒銷的辦法推銷“過剩”商品。一九五八年，有五分之一工業品是靠消費貸款推銷出去的。一九五九年一年中發放了九百多億第納爾消費貸款，比一九五八年又增長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許多企業由於產品積壓，不得不削減生產。有些企業為了保持商品的高價，甚至採取大批銷毀商品的手段。南斯拉夫《星期三消息報》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報道，某些農場和商業企業“為了保持正在流通中的蔬菜的高額價格”，曾把成噸的蔬菜和其他農產品拋進河裡。這種現象在南斯拉夫並不是個別的。一九五八年，《戰



斗报》上曾报道过在南斯拉夫的牛奶产区用大量牛奶喂猪的消息。铁托自己在一九五四年曾供认：在南斯拉夫，企业“让产品毁坏，让其一半腐烂和糟塌，以便能够通过抬高物价从另一半中得到比从全部中所能得到的更多的利益。一句话，产生了资本主义世界上最消极的现象”。一部分企业在竞争和被排挤的情况下不能赢利，无力偿付税款、银行贷款和发放工人工资，结果只有倒闭。据南斯拉夫《解放报》副刊《世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报道，在四年中倒闭了两千家企业。又据今年头十期南斯拉夫《联邦公报》公布的材料，在今年一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五日的两个多月内，就倒闭了一百一十八家企业。工人失业的情况十分严重，失业军的庞大队伍在逐年扩大。据南斯拉夫《指数》一九六〇年第五期公布的数字，一九五五年失业者有六万七千多人，一九五六年近十万人，一九五七年十一万五千多人，一九五八年十三万二千人，一九五九年十六万一千多人，一九六〇年二月增加到二十一万六千多人。南斯拉夫报刊报道，目前南斯拉夫工人失业的现象仍在继续发展，企业中普遍出现所谓“剩余劳动力”，“除了把他们解雇以外，很难找到其他出路”。

南斯拉夫经济中的这种种困难，完全是铁托集团自己造成的，是铁托集团使南斯拉夫离开了社会主义的轨道、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投靠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结果。铁托集团实行“企业自治”，标榜什么“国家消亡”、“经济民主”，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们的叛

徒行为蒙上一块遮羞布，借以欺骗南斯拉夫劳动群众，同时，也是为了把经济上的困难转嫁给南斯拉夫劳动者。铁托集团的“企业自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规定工人的收入要依企业赢利的状况为转移，如果企业赢利小或者有亏损，工人的收入就要大大压低。

在南斯拉夫，经常性的物价上涨，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普遍下降，生活状况恶化。有时，工人的工资名义上虽然有些增加，但由于物价上涨，这种增加实际上化为乌有。据《指数》一九六〇年第九期报道：四口之家的工人家庭，一九五九年的生活费用指数比一九五三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据《战斗报》今年三月十四日报道，一九六〇年的生活费用又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一。今年三月三日的南斯拉夫《经济评论》报道：最近几个月来，除了毛织品外，一切纺织品都“直线地提高了价格”；食品工业“也提高了绝大部分产品的价格，面粉和面条的价格正在直线上涨”。据今年三月十四日的《战斗报》说，今年头两个月的生活费用比去年十二月份又增加了百分之十五。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加班工作。至于在那些遭受亏损的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或失业的工人，他们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

本文以上所反映的这些材料，只是南斯拉夫报刊所透露的关于“企业自治”的情况和其他有关情况的几个侧面。即使从这些材料中，人们就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铁托集团



的所謂“企业自治”和所謂“国家經濟职能消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在铁托集团統治下的南斯拉夫，国家并没有消亡。铁托集团提出所謂国家消亡的主張，是为了掩盖南斯拉夫正在蜕化为資本主义国家的事实，并且借以攻击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优越于資本主义制度，是由于生产資料的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生产的有計劃按比例发展代替了无政府状态，可以自觉地利用客观經濟規律的作用来为社会謀福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濟职能，是在于認識和利用客观經濟規律，有計劃地进行經濟建設，发展生产，为全体劳动人民謀福利。就对外經濟关系來說，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发展相互之間的經濟合作以及同其他国家之間的平等互利的貿易关系，另一方面，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保卫本国的經濟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經濟作用，代

表着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受到劳动人民的积极拥护，使国家的集中领导同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創造性可以最好地結合起来。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經濟作用的最好的证明。

列宁曾明确指出，国家的消亡，只有在彻底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列宁指出，那种认为在从資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就应当取消无产阶级的国家对經濟的管理的主張，是同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他认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必须要有管理整个社会經濟的中央领导机构。

铁托集团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学說，攻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对經濟的管理，在南斯拉夫搞什么“企业自治”，这正是他們背叛无产阶级事业、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效劳的一种表现。

